

王羲之《十七帖》研究

黄君 著

 文物出版社

王羲之《十七帖》研究

黄 君 著

文物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崔 陟

责任印制：王少华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羲之《十七帖》研究/黄君著. —北京: 文物出版社,
2009.8

ISBN 978-7-5010-2723-1

I. 王… II. ①黄… III. 王羲之(303~361) — 书法 — 研究 IV. J292.112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34966号

王羲之《十七帖》研究

黄 君

出版发行: 文物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

<http://www.wenwu.com>

E-mail: WEB@wenwu.com

邮 编: 100007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制版印刷: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×1194毫米 1/16

印 张: 7.75

版 次: 2009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10-2723-1

定 价: 68.00元



集王羲之《十七帖》字成七律一首（代序）

黄 君

心驰梦冀尽峨眉，
致信悠悠彼蜀西。
欲广异闻寻一往，
兼怀离恨叹多悲。
将军虽老欣游目，
逸兴还张俟远期。
勿谓奇缘曾未果，
奇书天下具来希。

在“书圣”王羲之传世作品之中，《十七帖》是最重要、也最能代表其书艺成就的草书剧迹。本书拟对这一千古名帖作比较全面的研究。

目 录

集王羲之《十七帖》字成七律一首（代序）	1
一、法书龙象：《十七帖》的来历和基本形式	1
二、暮年老笔：《十七帖》的系年	7
三、巴蜀情结：《十七帖》的基本内容	19
四、今草法式：《十七帖》的草书特征	48
五、千秋典范：《十七帖》对后世的影响	52
附录、黄君临王羲之《十七帖》	87

一、法书龙象——《十七帖》 的来历和基本形式

《十七帖》是至少自唐代以来就受到特别关注的一卷右军草书显赫书作。张彦远《法书要录》卷十《右军书语》辑录唐代存世的王羲之460多件书作文字，其余书作全部不记录书作形式及来历，唯独当头第一种《十七帖》郑重记录道：

《十七帖》长一丈二尺，即贞观中内本也。一百七行，九百四十二字。是烜赫著名帖也。太宗皇帝购求二王书，大王书有三千纸，率以一丈二尺为卷。取其书迹及言语以类相从缀成卷。以“贞观”两字为二小印印之。褚河南监装背。率多紫檀轴首，白檀身，紫罗襪织成带。开元皇帝又以“开元”二字为二小印印之。跋尾又列当时大臣等。《十七帖》者，以卷首有“十七日”字故号之。二王书，后人亦有取帖内一句语稍异者标为帖名，大约多取卷首三两字及帖首三两字也。

张彦远的此一著录，是研究《十七帖》相关问题最重要的早期资料。分析其说，有如下四个要点值得注意：

1、《十七帖》是唐太宗（李世民）贞观时期（公元627~649）内府所藏一卷显赫著名的法书，其长一丈二尺，共107行，942字；

2、唐太宗（李世民）曾向全国广为收集二王书法遗迹，其中收到王羲之书法有3000纸，这些作品按“书迹及言语以类相从”的原则，经过整理后，装成若干卷，每卷的长度，都与《十七帖》一样，为一丈二尺长；

3、当时这些收集的作品由内府大臣褚遂良等负责整理、监裱，且多以紫檀为轴首，白檀为衬，紫罗襪织为带。在每帖接缝之处押有“开元”二字小印。此后到唐玄宗开元年间（公元713~741），又在这些卷轴上加盖了“开元”二字两方小印，并在帖尾处加署了当时参与整理诸大臣的名字。

4、《十七帖》名字的来历是因为卷首有“十七日”几个字，取其方便明瞭。这种给字帖命名的办法在当时很常见，后来也有取帖内一句话中的两三个字为帖名者。

按，唐太宗广求天下二王法书，时在贞观十三年（公元639），是唐代书法史上的重要事件，不少文献均有记载。张彦远上述记载中有一个问题值得深究：即《十七帖》何以能在3000件收集到的作品中，独领风骚而成为

“显赫名迹”？笔者根据诸多文献记载进行综合分析认为：《十七帖》在当时是以整卷形式收集到的，而其原装可能出自南朝梁内府。

唐张怀瓘《二王等书录》中有这样的记载：

贞观十三年（639），勅购求右军书，并贵价酬之。四方妙迹，靡不毕至。勅起居郎褚遂良、校书郎王知敬等于玄武门西长波门外科简。内出右军书相共参校。令典仪王行真装之。梁朝旧装纸见存者，但裁剪而已。右军书大凡二千二百九十纸，装为十三帙一百二十八卷。真书五十纸，一帙八卷，随本长短为度；行书二百四十纸，四帙四十卷，四尺为度；草书二千纸，八帙八十卷，以一丈二尺为度。并金缕杂宝装轴织成帙。其书每缝皆用小印印之，其文曰“贞观”。

此则记录中不仅提到原存内府有可供“共参校”的右军书，而且有贞观年间收集到的“梁朝旧装纸见存者”，这其中是否包括《十七帖》？虽未明确，但推想应可能性很大。此外，唐韦述开元年间所作《叙书录》有类似记录更详细：

右军之迹，……草书二千纸，装为八十卷，……其古本，亦有是梁隋官本者。梁则满骞、徐僧权、沈焯文、朱异，隋则江总、姚察等署记其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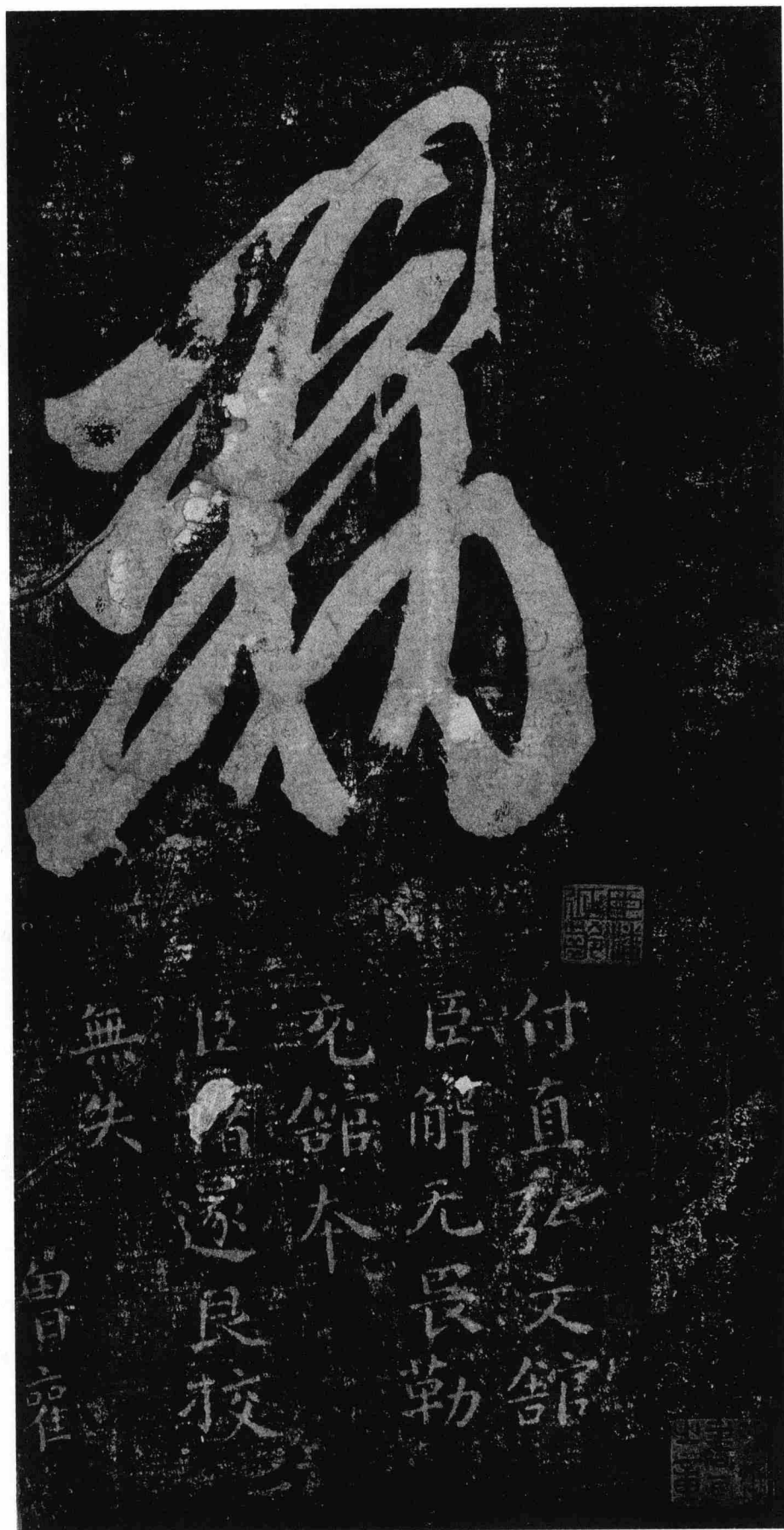
按，今传世“馆本”《十七帖》尾部正留有梁徐僧权题署的痕迹（关于《十七帖》尾“勅”字及徐僧权等题字，王玉池先生考证认为是宋代人伪造。但笔者以为书尾题署字迹即使是后人所写，但其内容必有所根据，依然可据为史料）。这是《十七帖》原装出于梁朝内府的重要依据。贞观十三年（639）它被征集到唐朝内府时，理所当然成为所有征集作品中最显赫的书迹。笔者进一步推断，当时草书80卷，每卷长“率以一丈二尺为度”，可能是按照此卷《十七帖》长度为标准来确定者。

另外，还有一则旁证材料。宋黄庭坚《题右军十七帖后》云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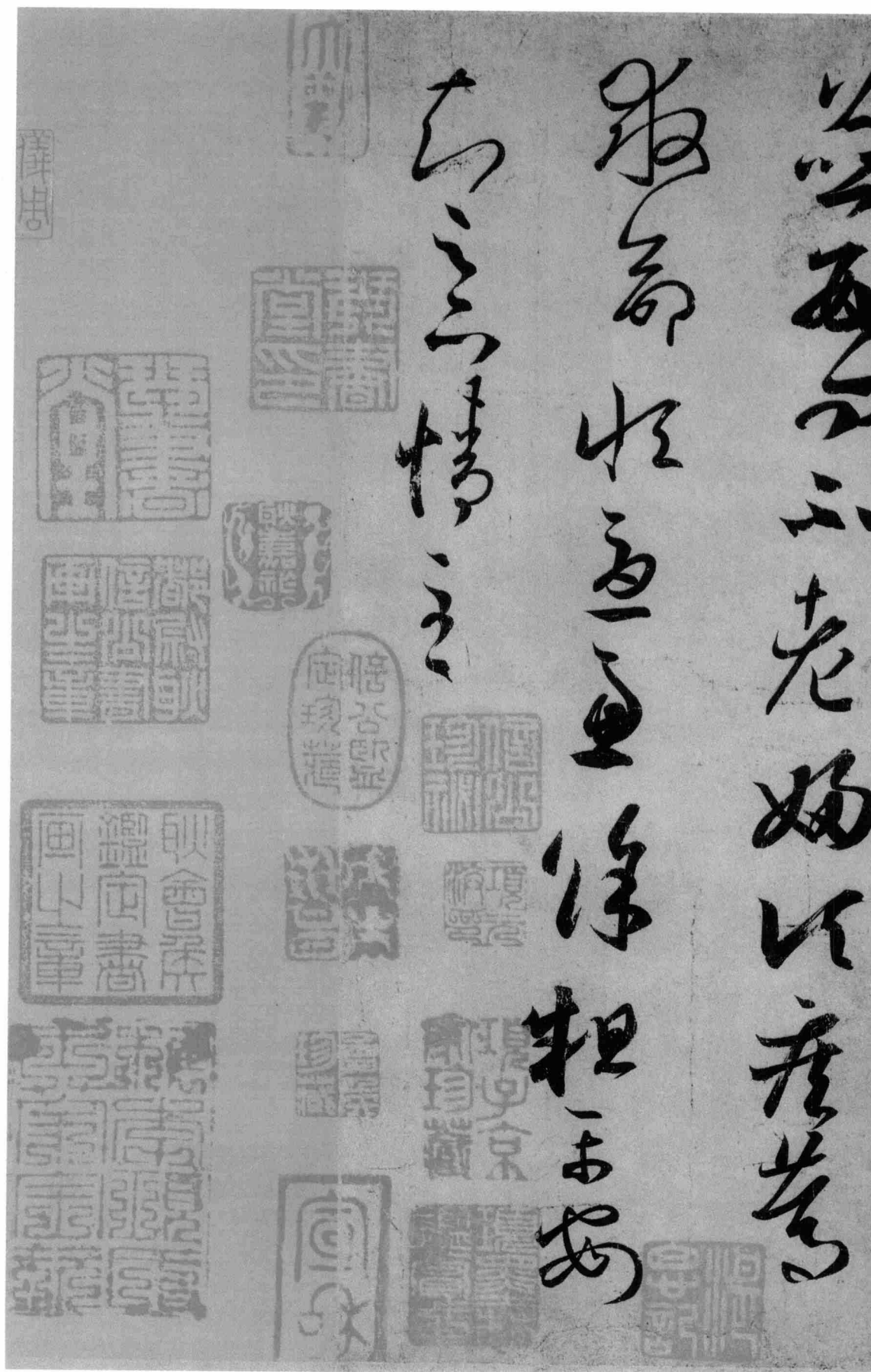
《十七帖》者，必多临本。永禅师及虞世南、褚廷海临写，皆不甚远。故世有数本，皆不相同。（见《黄庭坚全集》P1622，四川大学出版社，2002年版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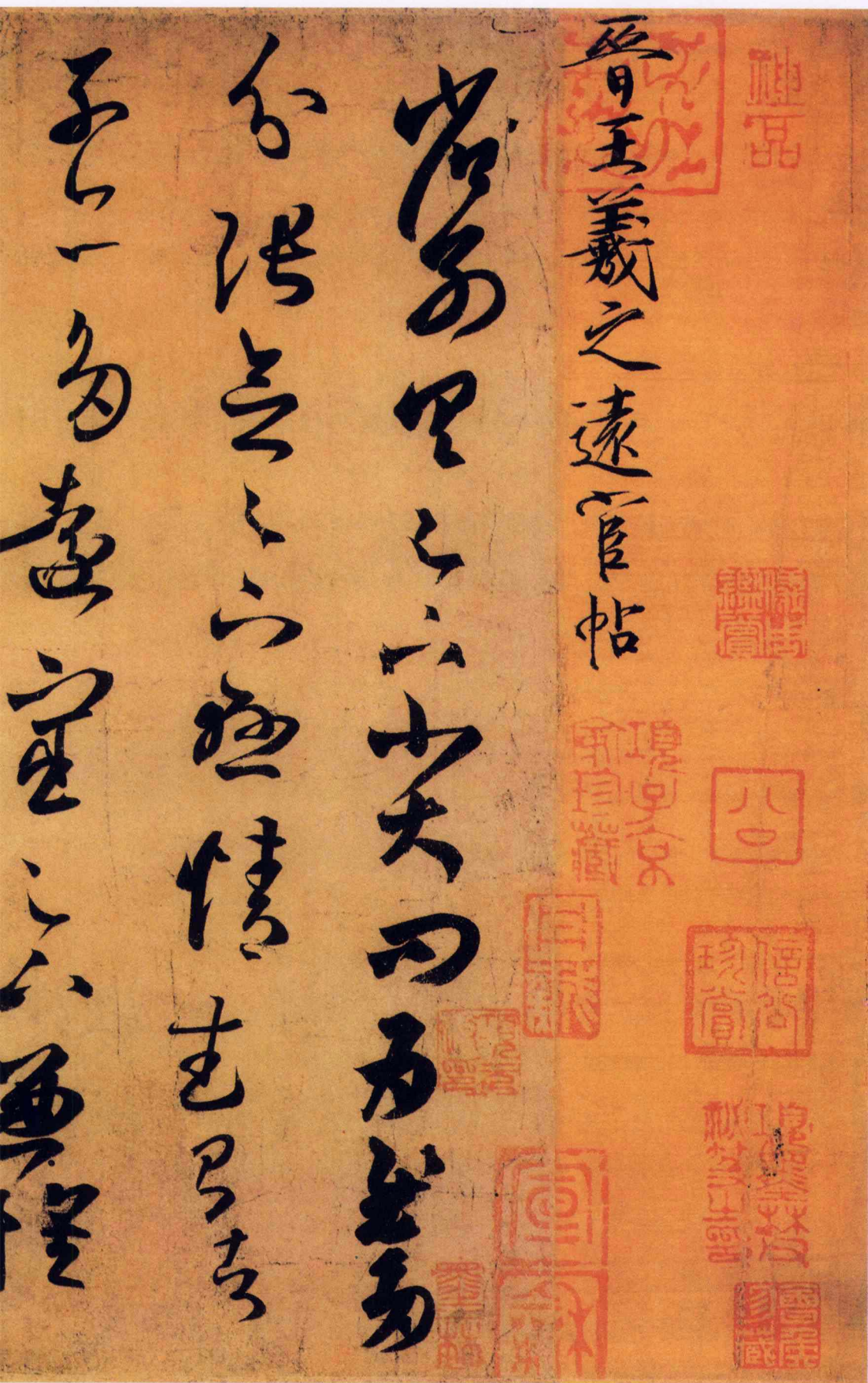
按，“永禅师”即释智永，俗姓王，羲之七世孙，南朝陈末至隋初僧人，居山阴永欣寺，以习王书而知名。虞世南（558—638），唐初书法家，逝世于贞观十二年。二人均生活在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广求天下王书之前。即然他们都有《十七帖》临本流传于世，则他们生活的时候已有《十七帖》存在，便是不言而喻的事情。

又，王玉池先生《十七帖在王羲之书迹中的地位和重要版本述评》一文中提到“关于《十七帖》的来源，有材料说，是贞观初年进士裴业所献。裴业其人情况不详。”（参王玉池《二王书艺论稿》P234，文化艺术出版社，



付直弘文館
臣解元畏勒
充館本
臣省還良校
無失
曹霍





此墨迹《远宦帖》，是《十七帖》中唯一幸存的唐代摹本，且钩摹精细，墨韵传神，弥足珍贵。

2003年版)王先生的这一线索,与《十七帖》系贞观内府整卷藏品的推断相吻合。笔者相信,王先生所称这则“材料”必定是有来历和依据的。可惜材料出处王先生没有明说,笔者孤陋暂未及见。有待查核。

至此,有关《十七帖》的来历至少可以上溯到南朝梁时期,即大约在公元402~457年间,此时离王羲之逝世还不足百年。且梁朝皇室极重文墨,武帝萧衍文才超群,善音律,精书法,并有《古今书人优劣评》等书论著作行世。梁代承袭刘宋传统和成果,内府所藏二王等书迹颇丰。《十七帖》当系此时内府精心选编装裱而成。一种文化现象,总有它形成的具体原因,确认了《十七帖》的特殊来历,我们便能理解,为什么人们一致把它推为右军显赫著名第一法帖。

宋黄伯思自跋所书《十七帖》后云:

逸少《十七帖》,书中龙也。张彦远以为王草中烜赫著名帖,信然。
(见黄伯思《东观余论》)

由于《十七帖》法书龙象的显赫地位,唐宋以来翻刻、复制者很多。有关刻帖版本诸问题,本文不作深入讨论。但必须指出的是,能真实反映王羲之书法精神的《十七帖》是如前所述经唐代内阁整理后摹勒上石者,通常把这一系统的版本称为“馆本”。宋以后馆本在帖尾有唐玄宗所题“勅”字,并有“付直弘文馆臣解无畏勒充馆本,臣褚遂良校无失”等20字题署及梁徐僧权署题痕迹,故又称“勅字本”。唐人所见内府《十七帖》整卷原迹至宋代已不复存世,但其中一帖唐摹墨迹今存台北故宫博物院,这就是赫赫有名的《远宦帖》。此帖流传有序,且钩摹精良,笔墨传神,弥足珍贵。此外,历代名家所临《十七帖》原迹或刻本的传世,也是《十七帖》显赫地位的又一反映。《淳化阁帖》收有《十七帖》中14帖,相传为唐贺知章所临,最初由南唐李煜刻入《澄清堂帖》。因宋以后《阁帖》翻刻流传极广,由此形成《十七帖》在馆本之外的贺知章临本系统。

《十七帖》实收作品情况,按张彦远记录为23帖,107行,942字,但今传馆本系统的唐刻宋拓本《十七帖》通常为29帖,129行,1159字。帖名依次是:1、郗司马帖,2、逸民帖,3、龙保帖,4、丝布衣帖,5、积雪凝寒帖,6、服食帖,7、知足下帖,8、瞻近帖,9、天鼠膏帖,10、朱处仁帖,11、七十帖,12、邛竹杖帖,13、蜀都帖,14、盐井帖,15、省别帖(远宦帖),16、都邑帖,17、严君平帖,18、胡毋帖,19、儿女帖,20、谯周帖,21、讲堂帖,22、诸从帖,23、成都城池帖,24、,25、药草帖,26、青李帖,27、胡桃帖,28、清晏帖,29、虞安吉帖。

分析今本《十七帖》与张彦远著录误差的原因,发现张彦远所录各帖顺序及连属关系略有不同,如第20帖实际包括现行刻本中的《青李来禽帖》、《胡桃帖》二帖;第13帖实际包括《谯周帖》、《严君平帖》;此外的《七十帖》、《邛竹杖帖》、《盐井帖》、《胡毋帖》、《清晏帖》计五帖,不见于《法书要录·右军书语》。

二、暮年老笔——《十七帖》的系年

《十七帖》所属29帖书艺风格完全统一，这显然是古人“取其书迹及言语以类相从缀”的结果，同时也可以肯定这些作品的创作时间，应大致相差不远。南朝宋虞和说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，迨其末年乃造其极。从《十七帖》整体书风看，当系暮年所作无疑。但这些作品究竟创作年代在什么范围？是否能给出一个相对确切的作品系年？为此，我们先从部分作品的考证开始。

首先，我们看《十七帖》之五，《积雪凝寒帖》（图1）云：

计与足下别廿六年，于今虽时书问，不解阔怀。省足下先后二书，但增叹慨。顷积雪凝寒，五十年中所无。想顷如常。冀来夏秋间，或复得足下问耳。比者悠悠，如何可言。

此信写道：算起来，我与足下（“足下”是古人对同辈或晚辈的尊称）分别已经有二十六年了。现在虽然经常可以通书信互致问候，但却不能解我对老朋友的思念向往之怀。最近收到足下先后写的两封信，又增添我许多的感慨。近来南方下了大雪，冰冻寒冷，这样的天气有五十年未出现了。想念之情更加甚于往常。盼望着，大约来年夏秋之间，才能再收到足下的信了。近来很多事情颇为复杂，不知道怎么和你说。

王羲之与周抚的交往未知始于何时。如果能考证王羲之与周抚“别廿六年”的起始时间，则此书创作系年自可确定。清包世臣《艺舟双楫》卷下《十七帖疏证》中关于此帖云：

右军为（王）敦从子，至承器赏；（周）抚以府察为私人，故与右军特厚。太宁二年（324）敦为逆，抚率二千人从，敦败，抚逃入西阳蛮中。是年十月，诏原敦党，抚自归阙下。时右军为秘书郎，同在都。咸和初，司徒王导茂宏辅政，复引抚为从事中郎，旋出为江夏相，迁监沔北军，镇襄阳，历守豫章，代毋丘奥监巴东军，刺益州。计自太宁三年至永和五年，适二十六年。

包世臣认为王羲之与周抚之阔别时在太宁三年（325），所以系《积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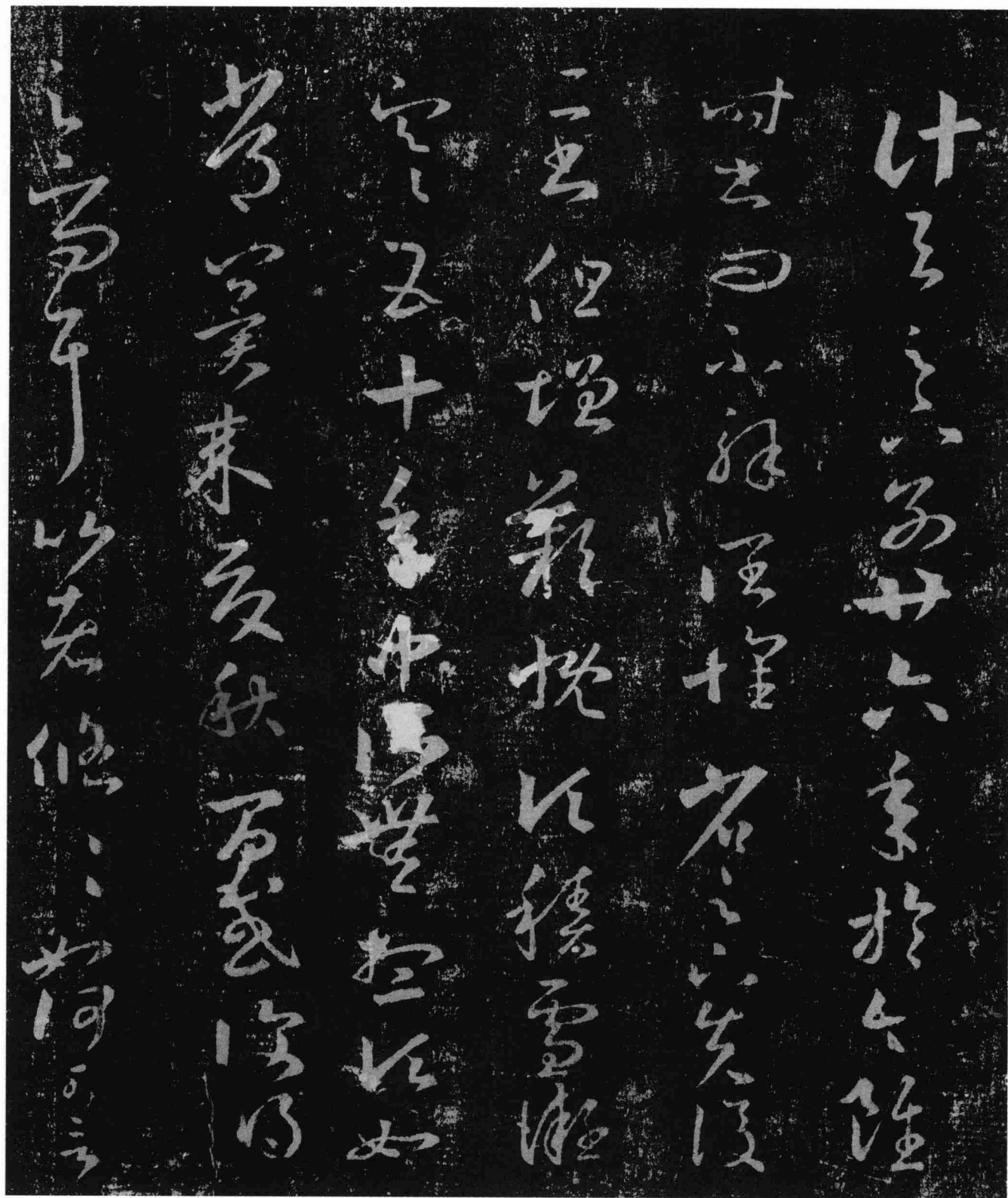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积雪凝寒帖（原《十七帖》之五）

凝寒帖》于永和七年（公元351），时王羲之49岁。

对包世臣的此一考证结论，现代学者多予以关注。王玉池先生认为“可供参考”（参王玉池《二王书艺论稿》P254，文化艺术出版社，2001年版）。祁小春先生除纠正结论中的“永和五年”为“永和七年”之误外，认为“这是十分精确的考证”。（参祁小春《迈世之风》P484，台湾石头出版社，2007年版）

不过，包世臣的上述结论其实很有问题！

按，周抚系王羲之嫂（籍之妻）周氏的从兄，与羲之有亲戚关系。羲之早年失父，依兄嫂抚养成人，视兄嫂如同父母，所以与周抚理应关系密切。

《晋史》卷五十八《周访传》后附有周抚小传。现据此并参与有关文献，整理传略如下：

周抚（292~365），字道和，浔阳（即今江西九江）人。晋中兴名将周访长子。王敦叛乱时，周抚三十来岁，曾与邓岳一起成为王敦的爪牙。王敦之乱平定后，周抚逃入西阳，不久获赦罪。成帝咸和初（约公元326年前后），王导当权，取用周抚为从事郎中，出任宁远将军、江夏相。咸和三年（公元328）苏峻乱，平反有功，改南中郎将，镇守襄阳。据《晋书·成帝纪》记载，咸和五年（公元330）因遭后赵石勒袭击，周抚失守襄阳而退归武昌，由此被免官。数年后，他再度被取用，迁振威将军、豫章太守，并代理益州刺史等职。永和二年（公元346）十一月以征虏将军随桓温攻蜀，三年，镇彭模。五年（349）四月，与龙骧将军朱焘（字处仁）击蜀汉范贲，平定益州，封建城县公，并正式接管益州刺史之职。从此留守治理巴蜀长达近20年。直到兴宁三年（365）去世。

考王羲之与周抚的交往，太宁二年（324）王羲之时年22岁，为会稽王友，非“秘书郎”，周抚33岁，二人是否相见，更无确切依据。笔者以为，王羲之所任会稽王友之职在内宫，负责当时只有4岁的司马昱教育引导和陪护。按包世臣所述，周抚此时是有罪方赦“自归阙下”之人，此时与王羲之见面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。故太宁三年（公元325）不可能是两人阔别之始。一个重要的线索是，咸和五年（330）周抚因失守襄阳免官后退居武昌，王羲之以咸和九年（334）亦至武昌为庾亮参军。考周抚永和二年（346）下半年才解豫章太守之职，随桓温伐蜀。从咸和五年（330）到永和二年（346）的16年间，周抚前期免官居武昌，后期任豫章太守，而担任豫章太守，时间按常理至多不会超过10年，由此推知他至少在公元330~336的五、六年间应生活在武昌。以周抚与王羲之的关系推断，二人在武昌见面可能性相当大。再往后，王羲之以咸康六年（340）任江州刺史，不久赋闲居家，直到永和四年（348）入朝为护军将军。而周抚则于永和二年（346）前一段时间任豫章太守。江州、豫章即今天的江西省九江与南昌，两地不仅相距不远，而且都靠着潘阳湖，以水路为主要交通的古代，两地往来非常方便。既然周抚与“右军特厚”，推想两人在这一段时间也不会没有见面的可能。倒是永和二年之后，王羲之与周抚各在东西，没有见面的机会。

根据上述分析来推论，王羲之与周抚阔别廿六年的起始时间，大致应在咸和九年（334）至永和二年（346）间。如果按此时间段顺推26年，则为公

元360~373年。又羲之于公元361年（升平五年）逝世。由此则可以锁定王羲之与周抚阔别前的最后见面，必定在武昌庾亮参军任上的头两年，即咸和末（334）永和初（335）。所以，《积雪凝寒帖》应写于360（升平四年）~361（升平五年）间，即王羲之逝世的最后一、二年。

又《十七帖》中另外一帖《远宦帖》提到“武昌诸子亦多远宦”，其中“武昌诸子”即指“羲之在庾亮参军任上诸同寮（考证详见第三章），这可与《积雪凝寒帖》互为因果。

其次，看《七十帖》（图2）云：

足下今年政七十耶？知体气常佳，此大庆也。想复懃加颐养。吾年垂耳顺，推之人理，得尔以为厚幸。但恐前路转欲逼耳。以尔要欲一游目汶岭，非复常言。足下但当保护，以俟此期。勿谓虚言，得果此缘，一段奇事也。

此信说：足下今年刚好七十岁吧？知道你身体很健康，这是大可庆幸的事。推想你会勤加保养。我即将六十岁了，按照一般的人生规律，能活到这个年纪也不容易，算是我的大幸。但担心往后的身体变坏，可能会窘局难堪。正是这个原因，我想近快到你蜀地，一游汶岭。这不是随便说一说的，足下你尽管多加保养身体，等着我来游的这一天。不要以为是开玩笑，如果能完成我们这一计划，可以说是当今的一段奇事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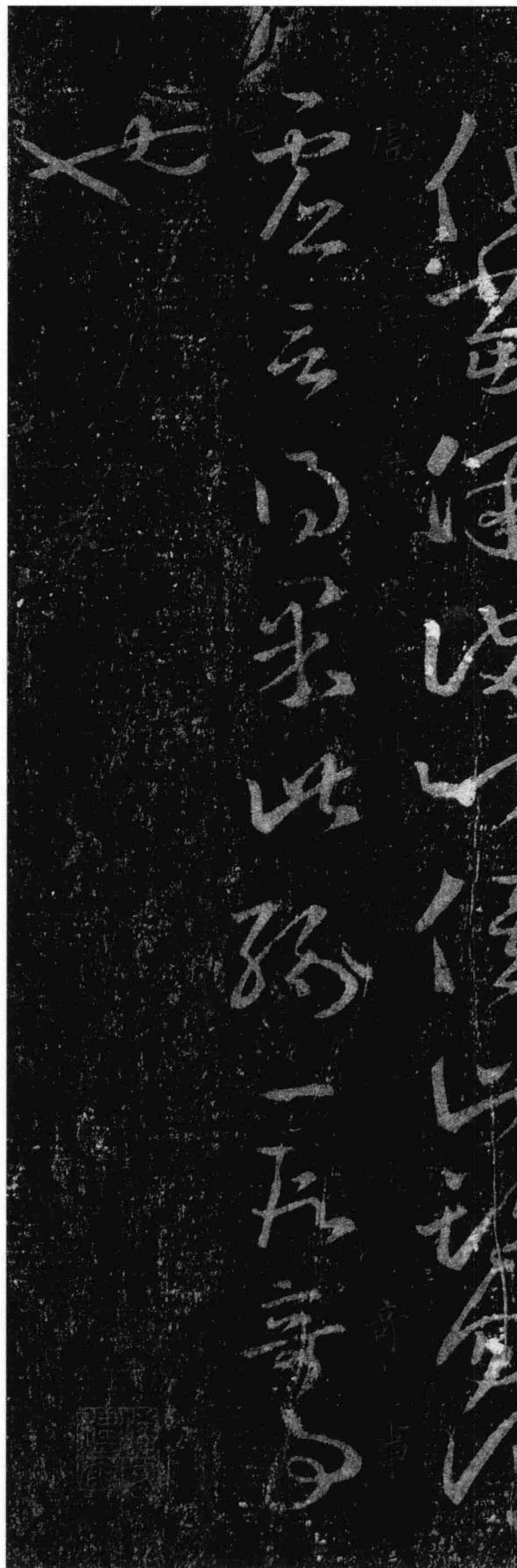
按，王羲之比周抚小十一岁，周抚70周岁应为公元361年即升平五年，这一年羲之59岁，正是“年垂耳顺”的时候。所以可以肯定《年垂耳顺帖》当是升平五年（361）即羲之逝世当年所写。

又，《儿女帖》（图3）云：

吾有七儿一女，皆同生。婚娶以毕。唯一小者尚未婚耳。过此一婚，便得至彼。今内外孙有十六人，足慰目前。足下情至委曲，故具示。

此信说：我有七个儿子一个女儿，都是同母所生。现在孩子们婚嫁的事情基本完成，就差一小儿还没有完婚了。等为小儿办完这桩婚事，我就可以放心去你那边游玩了。现在我的孙辈和外孙辈共有十六个孩子，足可以让我感到眼前欣慰了。足下你对我家的情意很盛，所以把这些情况一一都告诉你。

关于羲之有七儿一女之数，《晋书》卷八十王羲之传中亦有记载，据《琅邪临沂王氏谱》载，“七儿”依次是：玄之、凝之、涣之、肃之、徽之、操之、献之；一女之名，据王汝涛先生考证叫孟姜，即王羲之信札书语中多次出现的“姜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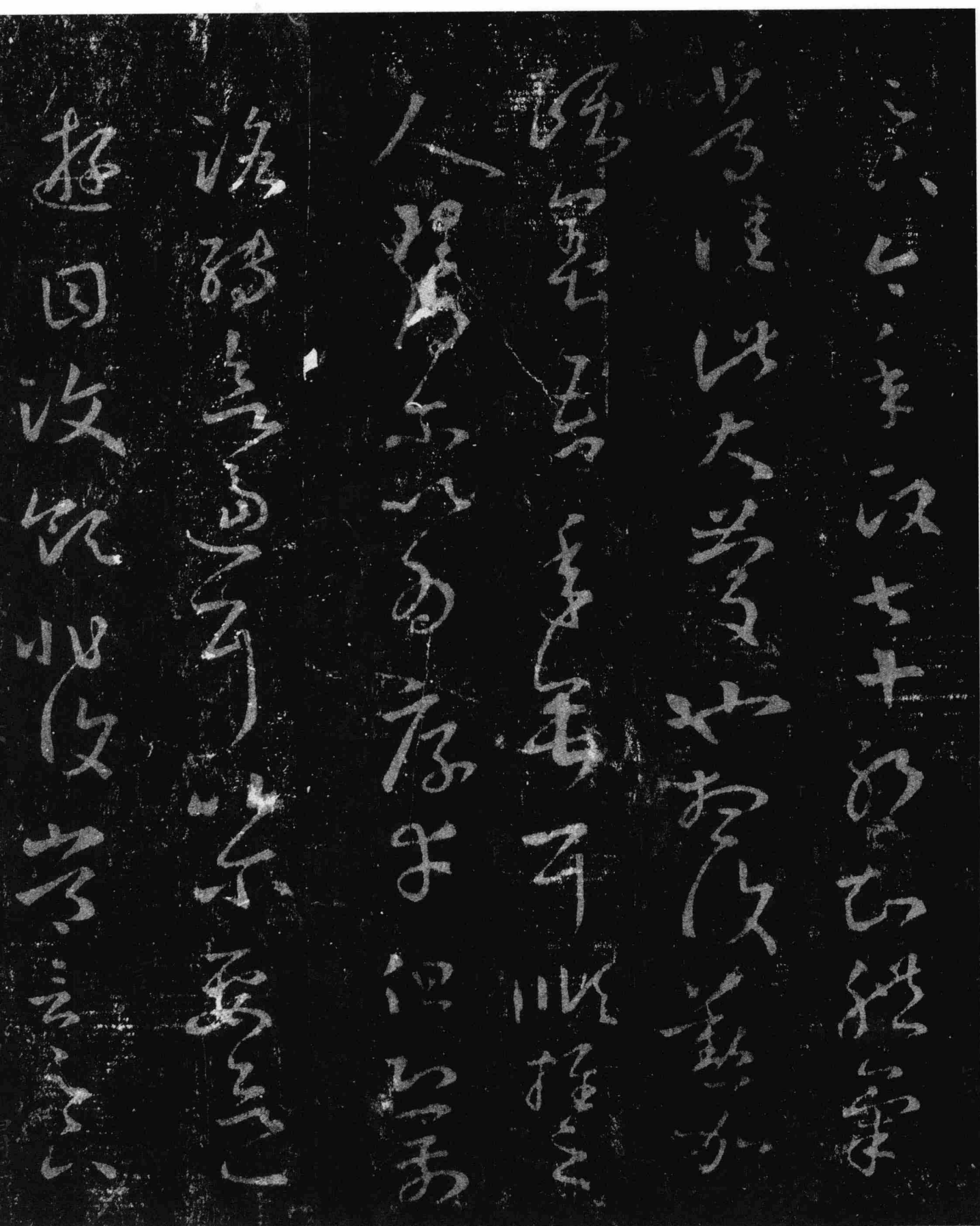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 七十帖（原《十七帖》之十一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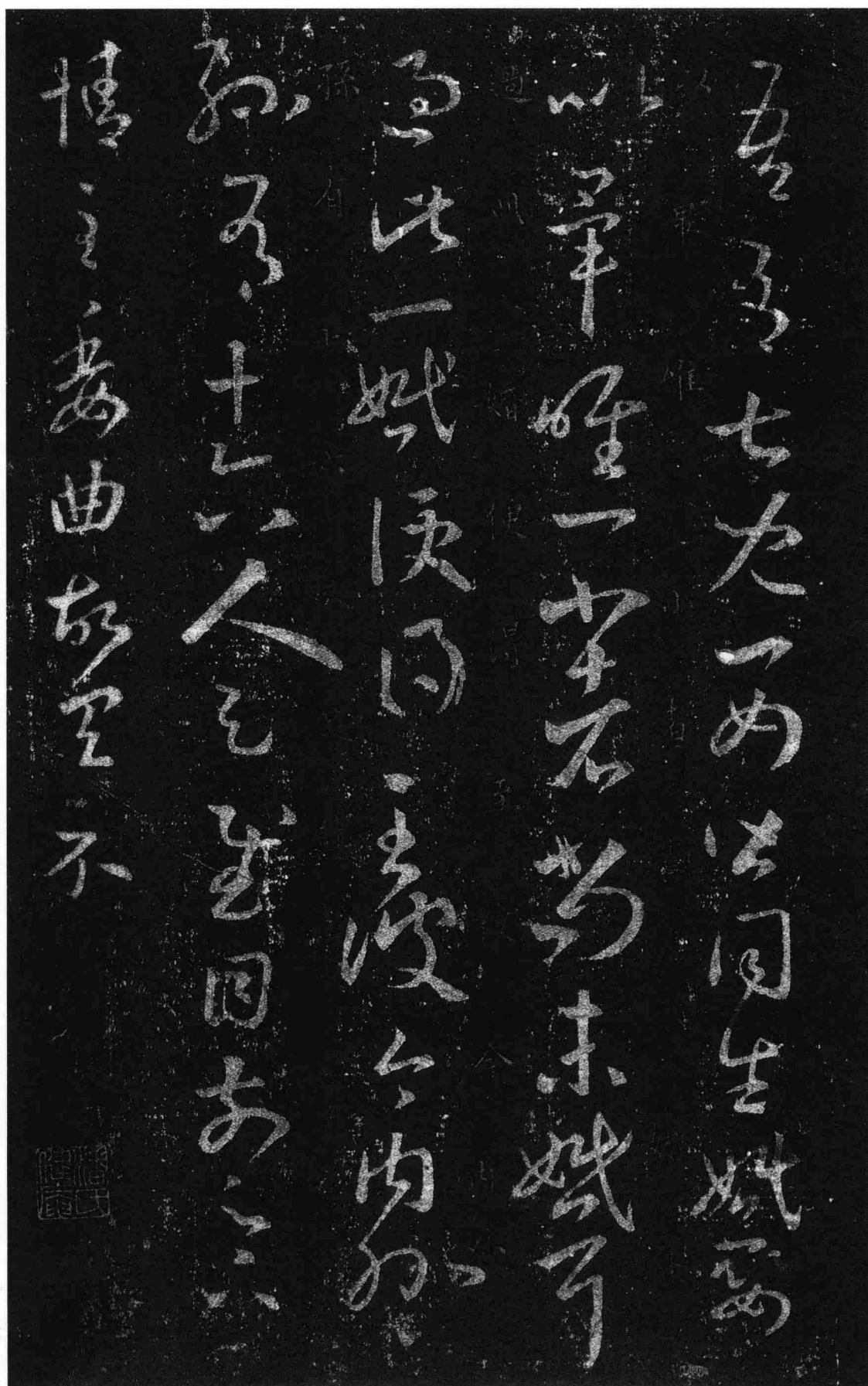


图3 儿女帖(原《十七帖》之十九)